



阅读人

2012年4月23日

星期一

第2期

(总第20期)

贵州民族学院图书馆 主办 秋韵文学社 协办

图书馆主页: <http://lib2.gznc.edu.cn>

社长:卢云辉

总编:潘梅

电子邮箱: yuedubaokan@126.com

内部交流, 免费赠阅

图书馆与大学精神

——纪念“4.23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世界读书日”全称“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又译“世界图书日”,最初的创意来自于国际出版商协会。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了“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要求社会成员人人读书,使图书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95年,国际出版商协会在第二十五届全球大会上提出“世界图书日”的设想,并由西班牙政府将方案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10月25日——11月16日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八次大会通过决议,正式确定每年4月23日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这一天也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和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辞世纪念日。“世界读书日”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发现读书的乐趣,并以此对那些推动人类社会和文化进步的人们所做出的伟大贡献表示尊重和感谢。

大学作为人类经验、知识、智慧的人格化存在,在引领思想、培养人才、推动创新、传承文明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每所大学,经历一代代人的坚实努力,积淀出这所大学的精神风貌和文化传统,此之可谓大学精神。凡精神之所在,皆情感之所聚,理智之所思,人心之所向。所以,大学重视其传统与精神,举足轻重。大学精神的传承与弘扬,有赖于师生深思好学,勤奋钻研,锐意进取,勇担大任。而大学治学氛围之浓厚、科研实力之增强,离不开师生热爱读书,热爱学习,把阅读当作不可须臾离之事。

阅读对人成长的影响巨大,一本好书往往能改变人的一生,让人生更精彩。图



书馆期待与全校师生一道,提高阅读乐趣,养成阅读习惯,营造读书氛围,提升“大学精神”。在“4.23世界读书日”来临之时,借更名“贵州民族大学”之势,在校

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校各院(系、部)、职能部门、校宣传部、校团委、校学生会等单位的通力合作和大力支持下,图书馆推出了纪念“4.23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突出“图书馆与大学精神”主题,其中包括:“读书与大学精神”讨论会、“我心中的大学精神”微博作品大赛、《阅读人》数字报纸、“图书馆与大学精神”专版、“我爱经典”露天诵读大赛、“享受音乐”摇滚专场演奏会、“阅读留言墙”、读者培训、学科服务宣传、“你选书,我付费”、送知识进社区活动等。

图书馆是大学精神的 重要守护者

黄达人(中山大学原校长)

今年暑假,我到新疆去参加一次学术会议,乘车穿行在新疆的大地上,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笔直的公路两旁绵延不绝的防护林。我觉得,这些防护林应该可以视作新疆的地标,不仅因为其醒目,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守护着人类的文明。我以为,图书馆之于大学的意义,或者与这防护林是相似的。图书馆是大学的地标,是大学的象征,是大学精神的重要守护者。

在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建设始终是处于重要位置的。在并校后的首次建设规划中,对南校区和北校区图书馆的扩建和整修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在东校区规划之初,我们又决定将图书馆作为整个校区的标志性建筑。今天,南校区的图书总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北校区图书馆的整修工程也已结束,东校区图书馆宏伟壮观,不仅成为中山大学东校区的一个标志,而且也成了广州大学城的一个地标。加上珠海校区图书馆,我校的图书馆总面积已经

达到11万平方米,藏书总量在国内高校中位居前列。可以说,目前的中山大学,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图书馆系统,设备先进,功能齐全,气宇轩昂,成为了学校教学科研支撑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这个图书馆系统可以视作欣欣向荣的中山大学的一个缩影。

在珠海校区和广州东校区一期建设的时候,我们就提出,那里可以没有行政办公楼,但必须要有高水平的图书馆。现在,这两个校区的图书馆已成为标志性建筑,而行政办公楼则没有纳入一期建设的规划。记得有一次我被请到省内一所新建高校为他们的建设规划做顾问,我提了一点意见,我说,这个规划中有行政办公楼而没有图书馆,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这个规划必须修改。这其实是我们一贯的思想,也是我们对图书馆之于大学的意义的一个认识。

中山大学图书馆作为文献资料的保藏机构,对于大学文化传承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中山大学的人文学科之所以可以在国内高校中处于领先地位,拥有一个高水平的图书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建设数字化的图书馆已成为一个紧迫的任务,令我们自豪的是,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数字化水平在国内高校中也是领先的。我学的是数学,我的博士生学习研究基本在实验室,看上去他们不去图书馆,但其实他们离图书馆更近了,因为他们每天都在使用着图书馆提供的网络资源。我的秘书最近刚读完了古典文学的博士,他告诉我,如果没有一个数字化的图书馆,他能在工作之余完成博士学业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些放在古籍阅览室中的几千册《四库全书》已经数字化了,他可以通过图书馆的网络检索这些浩如烟海的古籍。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山大学图书馆是与时俱进的,在全校师生的工作学习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还有一点令我们自豪,就是我校的图书馆与国际各著名高校的图书馆有着密切的交往,我们的馆长在国际图书馆学界是有地位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哈佛大学哈佛学院图书馆向我校赠书的盛事。

图书馆对于一所大学学风的培养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图书馆扩建之初,我要馆长保证,图书馆扩建的部分不能成为他们的办公室,而应该在改善馆藏环境的同时尽可能地扩大学生的自习空间。读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大学里最好的读书的地方是图书馆,图书馆不仅是借书的地方,而且是学生们最好的读书空间,这里有一种求学上进的气氛。所以,要看一所大学的学风,我想最好就是去看在图书馆里读书的学生们那些专注的眼神。我们如此地重视图书馆的建设,重视改善图书馆的环境,正是出于涵养中山大学优良学风的目的,是“善待学生”的一个最本质的体现。记得在扩建这个图书馆的时候,因为不可避免地要影响马岗顶的绿化,出于对学校的关爱,教师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那时我在网上作了一个回复,叫《我也爱马岗顶的树》,说明图书馆的扩建是学生的需要,也是大学发展的需要,得到了师生们的赞同。可见图书馆的重要性也是全校师生的一个共识。

我还想借此机会感谢图书馆的全体员工,感谢你们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你们克服困难,延长了图书馆的服务时间,为师生们提供了优质的服务。近年来,图书馆为在校学生提供了大量勤工助学的岗位,这不仅培养和锻炼了学生,而且还为学校用人机制的改革提供了经验。

现在,一座座宏大轩敞的图书馆已经出现在中山大学的校园之中,在今后的日子里,让我们用最喜悦的心情走进这些知识的殿堂,去感受知识带给我们的愉悦。

(黄达人,《图书馆是大学精神的守护者——在中山大学图书馆80周年馆庆暨新馆开馆典礼上的讲话》,载《大学图书馆学报》2005年第1期,2页,57页)

图书馆礼赞

(一) 敬业的图书管理员



在学言学,我访美接触的多是学术单位,自然注意的也是这方面居多。有人问我最羡慕什么,我说图书馆、档案馆太方便,太好了。当然这反映了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不过这里我要着重谈的是工作人员的敬业精神。首先他们对主管的专业都很熟悉,如数家珍,而且有为读者服务的明确观念,不厌其烦地解答问题,帮助查找。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深刻:一次在在美访问学者期间,临时赴华盛顿,在国家档案馆查了两星期的档案,接待我的是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他在了解我研究的题目之后,立即详细介绍馆藏有关资料,其认真、细致、周全远超出我的期待,既像是最好的助手,又像是导师。他默默无闻地在这岗位上想必已有多多年,看得出带有一种职业的自豪感。最令我感动的是,在我回到原地几星期之后,忽然接到他的来信称:上次你来时,有一匣有关的档案放在别的分类架上,因此没有提供给你,请方便时再来华盛顿查阅。对我这样一个素昧平生的外国人认真到这个地步,令我惊叹之余,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更不敢马虎了。重要的是这并不是例外,这种敬业精神随处可见,特别是在图书资料、秘书等辅助性的工作中很少见到那种大事做不来、小事不屑做,把怨气撒到工作上的情况。推而广之,在各行各业,基本上都是如此。

(《漫谈美国人的行为文明》,节选自资中筠著《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168-169页)

(二) 馆藏丰富、管理有方

离开国际问题研究所已有11年,每忆及研究所,总是最先,甚至主要想到图书馆。事实上我于80年代初要求调到研究所工作,可以说就是冲着图书馆来的。当时由于种种历史背景,在外交部系统(包括附属单位)中,放弃去使馆工作的机会而诚心诚意主动要求来研究所的,据说我是第一人,令许多人惊讶。其实人各有志,研究所对于我的吸引力一是充裕的读书写作的时间,二是馆藏丰富、管理有方的图书馆——这是我有一次来借查资料时偶然发现的,令我艳羡不已。果然,在研究所工作的5年中,图书馆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和无穷的乐趣,同时,以陈尺楼老先生为首的奠基人和管理人员的敬业精神也令我感佩,至今印象深刻。国际问题研究所图书馆的一大特点就是专业书籍资料的覆盖面广而系统。除了有关国际问题的报刊杂志和中外书籍订阅、采购及时外,工具书类别广,起始年代早,也是许多其他同类图书馆所不及。

随便举几个我直接接触到的例子:这里有相当全的美国和英国的历年国会纪录,有整套的《美国外交文件集》(国务院解密档案,以其简称“FRUS”闻于世),有自1929年以来的《纽约时报》(合订本)等等,还有许多宝贵资料不在此一一列举。这种资料之宝贵之处在于全,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如果只有零散的卷帙,往往要查的那一卷刚好没有,就失去意义了。在几十年动乱、迁移之中要保存这么全的成套资料洵非易事,其中

贯穿了多少代管理人员的心血,更重要的是主要负责人对图书事业的热爱、眼力和责任心。也有人力所不逮的,例如我注意到1965年至1972年间出版的外国书籍和期刊均有一大缺口,显然那是“文革”期间百业皆废,图书馆的钟摆也停在这里,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空白。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建立起这样一座有独特传统的图书馆,能保持目前这样相对完整的馆藏多么不容易,更说明图书馆工作是“硬”任务而不是“软”任务。

我印象中这个图书馆还有一优良传统就是管理有序,借阅方便,工作人员态度极好(至少我在的时候是如此),有为研究服务的观念。如果只以藏书丰富自诩,而读者借阅十分不便,甚至重重设卡,像我国方今相当多的大图书馆那样,那是本末倒置。此事一靠制度,二靠人,后者尤其重要。记得我刚来不久,被通知去参加一次,由已经80多岁高龄的陈尺楼老先生亲自讲解本图书馆编目体系以及其他有关情况、制度,包括工具书使用方法等。后来知道,每有新人来所,凑足一批就举办这样一次介绍,已成惯例,事后我们又都收到一份分类编目表。足见图书馆对于研究工作服务的观念明确,态度认真。使人感到这里是欢迎研究人员多去使用的,后来我的切身感受也的确如此。

有一件事使我当时十分感动,至今难忘:在研究所尚未搬到现址之前,一次我需要查阅1950年的《纽约时报》,这对图书馆同志是很少遇到的难题,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提出的。谁知当时负责的杨慧颖同志二话没说,立即带领一位年轻男同志(非常抱歉,忘了名字)到地下室,硬是从尘封中一本一本搬动那沉重的合订本,直到找出有我要的那一天的那一本,并把它搬到阅览室。当时尚未有复印机,我想借用打字机把全文打下来,杨慧颖同志竟主动承担,第二天就把两页打好的文件交给我。我不善辞令,当时不知该如何感谢她,她似乎也没有把这当回事,不过我对这件事一直铭记在心,并常以此教育年轻人。那份宝贵的文献至今我仍保存完好。

对我个人来说,国际问题研究所图书馆确有特殊的帮助:1982年中美关于售台武器问题谈判进入关键时刻,我发表了《历史的考验》一文,系统论述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台政策,当时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被认为是受命配合形势而写。其实这纯属误解,在发表的时间上完全是巧合,真正启发我写此文的是图书馆藏的“FRUS”。根据美国外交档案30年解密制度,那时出版到50年代初,图书馆收到1950年,是相当及时了。我发现后如获至宝,啃了几个月才决心动笔写此文。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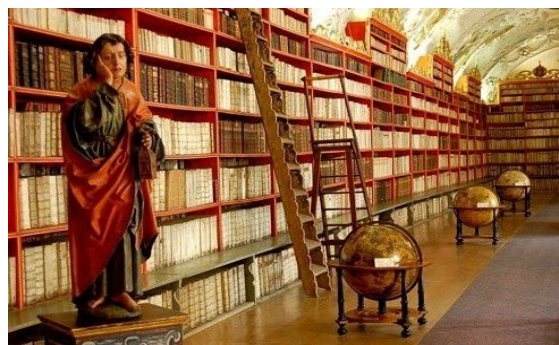
在这种文献对研究界已是司空见惯,但当时我国刚开放不久,与美国的学术交流还在起步阶段,这种资料国内尚不多见,只有极少数图书馆备有,本图书馆早就开始订购,全而及时,可算得很先进的。如果见不到那些资料,即使奉命也很难写出那样的文章来的,所以追根溯源,图书馆功莫大焉。

我的第一部专著,也是后来获社科科学院优秀成果奖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主要是在国际问题研究所期间写成的,依赖图书馆就更多,书后所列中外文参考书目至少有一半以上来自本图书馆。我调到社科院之后仍然常到这里来借书,尽管有些人员已经是新人,还是得到热情帮助。我主编的另一本著作,列入“七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美国战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1994年出版)主要依靠的数据库之一还是这个图书馆。所以我在两部书的前言中都特意对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图书馆表示感谢,这是发自内心的。由于我自己的领域是美国,所以举例主要是美国的,实际上图书馆所藏涉及世界各国,历史的与当前的都很丰富,凡使用过的有口皆碑。

记得已故中央党校李元明教授在撰写《国际关系史》(从古希腊开始)时,从图书馆借得大堆书籍资料,有的纸已发黄,他一再惊叹其宝贵,像对待珍奇古董一样小心翼翼捧回去,用毕又小心翼翼捧回来如数归还(当时图书馆还允许外借)。他完成的一生最后的力作《国际关系史》是一部规模宏大,非常有特色,学术价值很高的专著,涉及的时间、空间都极广阔,而他当时没有机会到国外收集资料,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好的图书馆作后盾是很难完成的。

在知人论世,包括评价某一个单位时,经常论及其“底子”厚薄、传统优劣。图书馆以其功能性质,这点尤其重要。国际问题研究所图书馆恰好是历史悠久,底子既厚,又有陈尺楼这样的老先生传下来的优良传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非常值得珍惜。

(《图书馆礼赞》,节选自资中筠著《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218-221页)



关于天赐的诗(1960)

(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

上帝同时给我书籍和黑夜,
这可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我这样形容他的精心杰作,
且莫当成是抱怨或者指斥。

他让一双失去光明的眼睛
主宰起这卷册浩繁的城池,
可是,这双眼睛只能浏览
那藏梦阁里面的荒唐篇什,

算是曙光对其追寻的赏赐。
白昼徒然奉献的无数典籍,
就像那些毁于亚历山大的
晦涩难懂的手稿一般玄秘。

有位国王(根据希腊的传说)
傍着泉水和花园忍渴受饥;
那盲目的图书馆雄伟幽深,

我在其间奔忙却漫无目的。

百科全书、地图册、东方和
西方、世纪更迭、朝代兴亡、
经典、宇宙及宇宙起源学说,
尽数陈列,却对我没有用场。

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我昏昏然缓缓将空幽勘察,
凭借着那迟疑无定的手杖。

某种不能称为巧合的力量
在制约着这种种事态变迁,
早就有人也曾曾在目盲之夕
接受过这茫茫书海和黑暗。

我在橱间款步徜徉的时候,

心中常有朦胧的至恐之感:
我就是那位死去的前辈,
他也曾像我一样踉踉跄跄。

人虽不同,黑暗却完全一样,
是我还是在写这篇诗章?
既然是厄运相同没有分别,
对我用甚么称呼又有何妨?

格罗萨克或者是博尔赫斯,
都在对这可爱的世界瞩望,
这世界在变、在似梦如忘般
迷茫惨淡的灰烬之中衰亡。

(节选自:博尔赫斯著,林之木、王永年译《博尔赫斯全集》(诗歌卷上),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149-151页。)

|大学名校长访谈录|



大学精神是什么

马国川:您认为大学精神是什么?

章开沅:我经常在想我们现在还有大学精神吗?今后大学精神的重建恐怕不是一代人的真诚努力所能完成的。大学之光在于文化的积淀、精神的传承和学脉的延续。教育在任何时代都不能忽略前后传承与相对的稳定,因为教育本身具有人所共知的长期性与持续性的特点。教育必须适应社会的变迁,但是教育的发展又具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有其绵延千年、衔接古今的内在规律。教育的个性在更多的时间里经常地表现为渐进式的积累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水到渠成”。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深厚的文化积淀、独立的大学精神、源远流长的学脉,正是其闪烁的大学之光,它照亮民族、照亮人类。

学风应该成为世风的先导

马国川:现在大学里存在各种学术抄袭的丑闻。

章开沅:真正的学者要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奉献更重于谋生,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诚,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出违心之言。我经常引用的一句诗是:“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要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必须明确治史为求真,是为保存民族文化,学术不是求名求利的私器。现在一些学者在学术上的堕落,抄袭还不是主要的,学术品格的堕落,是更大的问题。凡是存在的都是有根据的。因为社会一些不良的现象,就编造种种理论来稳固这些不合理的现象,这个比抄袭还可怕、还可恶。学风是世风的反映,学风又应该成为世风的先导。学风随世风堕落,随波逐流乃至同流合污,是最可怕的事情。我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经历了半个世纪以上的沧桑,我一直提倡树立良好的学风,学风应该成为世风的先导。我支持和倡议用各种方式揭露大学里存在的不良现象。

真正的一流大学要引领国家

马国川:记得有人说过,“可以相信,美国二十年之后还是世界一流强国,因为美国大学培养出来的是一流人才”。

王义道:我有个观点:如果一个国家离世界一流水平太遥远,这个国家就不会出世界一流大学。如果这个国家的大学是一流的,那么这个国家也一定是一流的。大学是一个国家科学文化的标志,真正的一流大学要能对国家起到引领作用,一流大学的水平和高度应该代表这个国家的水平和高度。美国最大的优点是它能够吸引世界一流的人才,中国呢?现在国内一些大学也有很多外国留学生了,可是他们学习的是汉语之类,这不算,什么时候他们学习的是我们的科学和典章制度,学成以后按照中国的做法办,这才是真正的一流大学呢。唐朝时期有很多日本留学生来长安,主要是学习中国的典章制度,学习中国的先进经验,而不是为了赶时髦学中国话回日本去炫耀的。什么时候留学生来中国学习科学技术、学习典章制度,就可以说中国的教育是世界一流的了。一流的国家能够把世界一流的学生留下来。

大学之道在育人

马国川:如果高等学校首先不是育人,那就不是学校;如果育人不立足于治学,那就不是高等学校。育人和治学,哪个放在前面呢?

杨叔子: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我们一些高等学校特别是一些重点大学,往往把治学放在前面,这是急功近利的表现。这不仅是中国大学的毛病,而且美国的哈佛大学也有同样的毛病。2006年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叫《失去灵魂的卓越》,是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前任院长刘易斯写的。什么是“灵魂”?就是培养对社会负责的公民,也就是育人。什么是“卓越”?在众多学术里争第一,用我国的话讲,就是要在众多学科建设里争第一。刘易斯批评说,哈佛大学为了在众多学术里争第一而忘记了培育负责任的公民的义务,“灵魂”丢掉了。我读完这本书后作了一个归纳:重治学,轻育人;重科研,轻教学;重研究生教育,轻本科生教育;重教师学术的博大精深,轻教师的品德优秀对学生的影响;重市场对高等学校的功利需要,轻视学校对学生人格尊严的培养。最后归纳为:重视近期的有形、有用,轻视长期的无形、无用。

理想的大学制度:独立、多元化、开放

马国川: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制度?怎样才能够建成科学合理的大学制度?

刘道玉:理想的大学制度与理想的大学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理想的大学制度,建设理想的大学就没有保证。中国未来教育的希望不在于某一个领导人身上,也不是一个教育家的问题,关键在于制度,我们要敢于去改变现有的制度,开创未来。

我所说的理想的大学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为数不多的准备建成世界一流的重点大学,它们应当以研究高深学问为己任。这样的大学应当拒绝功利主义,远离媒体,引导师生树立“以学术为志业”的终身志向。这样的大学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制度呢?理想的制度就是:独立、多元化、开放。什么叫独立?就是没有依附性。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说:“大学是无条件追求真理的地方,大学独立到什么程度?大学不仅相对于国家是独立的,而且相对于市场、公民社会、国家和国际的市场也是独立的。”

马国川:这个话是很深刻的。

刘道玉:为什么是要独立的?这是教育这个特殊职业的需要。康德说:“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在西方大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国才一百多年。为什么西方能够保持大学自治?因为西方大学从中世纪诞生以来就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既不受教会的影响,也不受政府的干预。这个传统一直沿袭到现在,是西方大学教育的精髓和传统。而中国的大学自其产生起就是政府主导的,像最早的京师大学堂、天津的北洋大学、武昌自强学堂,都是清朝政府皇帝御批的。所以中国的大学一开始就受皇权控制。解放以后,把教会大学、私立大学都取缔了,由政府统管的公立大学就成了一统天下,一直延续到今天。“文化大革命”以前,高教部直属重点大学23所,1978年确定的重点大学是34所,而现在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是72所。而且现在的大学都希望教育部管,因为教育部手里有资源,可以多拨经费、批专业、拨招生指标……所以大学拼命地往教育部门下挤,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人家是摆脱都来不及,而我们要拼命地往那里挤。

马国川:多元化怎么理解呢?

刘道玉:不管是从体制上还是从学科上、规模上以及办学风格上,都不要整齐一律,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各校办出各校的特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三个最吃香的热门学院都没有,就是不办,就是办好学校重点学科,如数学、物理。有哪一所大学能够跟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比肩呢?没有。不办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又何妨,无非是美国少了一所大学提供这三方面的人才,别的学校都可以提供啊。但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证明了费马大定理,解决了358年都解决不了的难题。

马国川:中国的大学一窝蜂,什么时候就赶什么时候,谈何多样化?

刘道玉:从国家来说,美国社会尊重多元化,这跟大学的独立性是相一致的,没有独立性也就没有多元化。

马国川:还有一个开放,怎么理解?

刘道玉:我们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全球化的世界,大学不可能封闭,要跟国际接轨,这就是要使自己的教育办学理念跟国际接轨,使自己培养的人才质量跟国际接轨;如果你的人才质量跟国际上没有可比性,怎么能够走向世界?怎么在国际人才市场上竞争?开放性就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资源共享,既合作又竞争,在办学理念上、人才质量上跟国际接轨。

(马国川著,《大学名校长访谈录》,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11-12,15,37,77-78,108-110页)

在科学研究中,有些研究项目并不需要经费,如牛顿和爱因斯坦的重大发现不需要一分钱。因此,当代一味的追求豪华、浮躁和铜臭味腐蚀了大学的灵魂,致使大学精神丧失殆尽。

西南联大的案例屡屡被提及。这所在民族危难之际临时组合的大学,就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活样板:在庙宇或简易平房上课,教授住

教育需要乌托邦

土坯农舍,人不敷出,需要典当家产养家糊口。但是,她在8年间却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从她培养的学生中涌现出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7个“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和172个中外籍院士。
“教育需要乌托邦。”年近八十的刘道玉说,柏拉图设想

园地依然还是馥郁芬芳。”这就是理想的作用,它们会激励人们在理想的道路上前行。

(文章来源:谢湘,堵力,理想的大学离我们有多远: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N/OL].中国青年报,(2012-05-03)[2012-05-03]http://zqb.cyol.com/html/2012-05/03/nw.D110000zgqnb_20120503_2-03.htm)

陈平原谈大学教授

大学校园里的故事,大多属于教授们。因为,学生日后可能有很大的成就,但在读期间,很难有十分出色的表现,除非是在政治变革或者大动荡的年代。比如说,1919年的五月四日那一天,北大学生傅斯年充当游行总指挥,带着学生们从天安门一直向东走过去,最后演变成火烧赵家楼。还有文革期间的学生领袖,也都出风头。只有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学生才有可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也才可能有故事流传下来。除此之外,大学校园里广泛流传的故事,大多属于教授们。

接下来的问题是,哪些大学教授常被追忆?哪些大学教授盛产传说与故事?在我的印象里,最容易被传颂的,是人文学科的教授。本来,现代大学和古典书院最大的不同,在于自然科学知识;现在学校评比、算硬件的时候,也是理工科的教授最重要。可一旦转化评价体系,不从量化的角度,而从故事的角度着眼,文科教授自然占主导地位。有一位理科教授很谦虚,说文科教授讲国学,影响大,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别人无法比;而我们理科的水平,跟世界一流比,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不太被记忆。我认为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因为,文科教授的工作比较容易被大众理解。你做文学、史学,比起那些做高能物理或分子化学的教授,更容易被大众接受,所以社会知名度高。但知名度高的教授,在科学研究方面,不一定成绩就大。也许,真正对社会贡献大的,是那些知名度不太高的理工科教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理科学生对他们的导师可能也很崇拜,但他们不会写,或不愿意写。而文科的学生擅长舞文弄墨,他们毕业后分散到五湖四海,谈到校园生活时,肯定会涉及到自己的老师。所以,大学文科教授,很容易成为大学生追忆的对象。第三,所有的追忆文章,关注的都是教授的性格才情,而不是具体学问。这也是性情比较洒脱的文科教授,容易被大家理解并传诵的缘故。就像刚才说的,没有读过陈寅恪的书,照样可以欣赏、崇拜陈先生,根据什么?根据的是关于陈先生的故事。比如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比很多讨论陈寅恪史学思想的著作更容易接受,影响也大得多。很多人正是因为这本书,理解、亲近、景仰、崇拜陈寅恪先生的。同样,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编撰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等,影响也很大,这让那些校史专家很不高兴。因为,他们认为我的说法不全面,只关注有趣的人物,而忽略了很多同样成果卓著的好学者。

没错,被记忆的,不一定就是学校里最优秀的教授。换句话说,当我们在传诵某教授的故事时,其实是有选择的,这跟我们对这所大学的“性格”的理解有关系。我选择了某一类型的传说与故事,代表着我欣赏这所大学的某一侧面。这种言说策略,确实跟校史专家不一样。换句话说,喜欢传播大学故事的人,其实心里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有自己的爱憎,借选择故事表达自己心目中的大学精神。传什么,不传什么,大有讲究。所以,现在流传广泛的北大传说、北大故事,过滤了很多原本存在但不被大家欣赏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故事不是大学的真实历史,更像是我们希望这所大学成为的那个样子。北大、清华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下面我举一两个大家比较生疏的例子。

前年秋冬,我在台湾大学讲学,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么两个教授的故事,一个是傅斯年,一个是台静农。傅斯年以前在北大读预科和本科,1919年毕业后赴欧留学,1927年归国,以后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1945年代理北大校长。国民党溃败到台湾,他当了两年台湾大学的校长。为了意识形态需要,国民党政府整肃教育,傅斯年以他当时的地位努力抵抗,大声疾呼,保持学术的独立。1950年12月,他在参加台湾省参议会,跟人争论大学独立,拒斥政府对大学的改造时,说到激动处,脑溢血当场去世了。台大校园里,常常被人提及的校长,就是傅斯年。台大校园里,有纪念傅斯年的傅园,在主校区办公楼前还建了一个悬挂傅钟的亭子。这是台大学生政治性集会的地方,也是其争取民主的象征。现在台湾的状态很不乐观,但年轻的

学生说起他们的老校长,依然会很激动。

傅斯年以外,我想谈谈台静农。早年跟鲁迅有较多交往的台静农,后来到了台湾,成为著名的杂文家和书法家。台先生在台大中文系教了几十年书,影响很大。让我感慨不已的是,多少年过去了,真的是斗换星移,可台大学生仍还记得他。最近,学生们在他们自己的网页上贴了一篇文章,那是林文月先生的《温州街到温州街》。林文月是个很有韵味的女学者、女作家,有才情,又会喝酒,她翻译了《源氏物语》,也写散文,研究也做得不错。她是台先生的弟子,后来也在台大中文系教书。这篇《温州街到温州街》,说的是台大的先生们原来都住在温州街,后来中间开了条大马路,把温州街切成了两半。一边住的是郑骞郑先生,另一边住的是台先生。这两位老先生,八十多岁了,互相记挂。郑先生出了一本诗集,请台先生题签,那一天,他要把诗集亲自送到马路对面的台先生那里去,于是请林文月开车。两位老人见了面,说了几句话,互相恭敬地点点头,就走了。不久,台先生就去世了,于是郑先生前去祭灵,写了一副挽联:“六十年来文酒深交弔影今为后死者,八千里外山川故国伤怀同是不归人。”台大的学生至今仍乐于传说这两位先生的高情厚谊,这也是他们接受林文月文章的原因。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了,连林文月先生也都退休了,但今天刚入学的大学生,还会找出这篇文章来读,这点让我很感动。两个台大老教授的剪影,很



传神。这样的故事,我以为,不会因为意识形态的流转而被人忘记。通过这些小故事,了解他们的长辈,也接触了这个大学的传统。在我看来,大学校园里,值得永远追忆的,不只是抽象的精神,更包括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1940年代,梅贻琦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叫《大学一解》,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啻远哉!”大学就像大海,老师和学生都是水里的鱼,小鱼跟着大鱼游,游着游着,也就变成了大鱼。正是在从游的过程中,学生们通过借鉴、理解、模仿,而最终成才。但现在的师生关系,更像是教授们在表演,学生们在观看演出。时间到了,学费付了,通过考试,获得一张文凭,就这样,完了。老师和学生之间,只是一个贩卖知识与购买知识的关系。这,去古人“从游”之义远矣。

刚才说了,老同学见面,不断有人追问我,现在大学怎么回事,为什么老出事,而且清一色都是丑闻?他甚至说:“看来,素质教育要从大学教授抓起。”我是这样辩解的:因为大家心目中,大学教授比较清高,一出事,很有新闻价值;如果是官员出事,见怪不怪,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正因为人们心目中大学教授的地位还是比较高,听到各种丑闻,才会拍案而起。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怎么衡量和评判大学教授的道德修养?这里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最高标准,一个是最低标准。在我看来,以前的最高标准太高,现在的最低标准太低。传统中国,对“师”的表述,接近于圣人,那样的标准太高了。大学教授们扛不起那么重的牌子,于是,皮袍下的

马脚,很容易就暴露出来了。现在,又有了非常通达的说法:“大学教授也是人嘛。”言下之意,出丑也没什么,很正常。这个标准似乎又太低了,就好像一句“领导也是人”,让一大批有劣迹的官员心安理得一样。这个说法,表面上是理解人生的艰难,实则大大降低了道德标准。记得我20年前刚到北京读书,前门一带有家商店发生口角,售货员打了顾客。受到舆论批评后,那商店为表示改邪归正的决心,在门口贴了一张标语:“坚决不打骂顾客!”我当时的感觉是哭笑不得,可人家很真诚,而且说的是大实话。就像今天的大学教授,如果降到高呼口号:“坚决不剽窃”,那也未免太可怜了。

30年前,我在粤东山村插队,当民办教师。有一次到公社开会,书记这样鼓励我们:“好好干,做好了,提拔你来镇上当售货员。”1993年,为了到瑞典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我写过一篇《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现收入《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其中提到,当年北京市出租车司机的收入约为大学教师的八到十倍。每次出门乘车,总有司机问我收入,然后充满同情地说:国家对不起你们啊!我在讲台上畅谈五四时期众多同情人力车夫的诗文,实在有点哭笑不得。现在,“脑体倒挂”的现象,基本上解决了。比起劳工阶层,大学教师不好意思再哭穷了。但又有了新的问题出现。

每年新生入学,我都得代表文学专业的教师,前去讲话。那一年,记得是在昌平园区,有新生提问:老师,你那么聪明,难道没有更高的追求,就甘心一辈子教书?我当时急了,慷慨陈辞大半天,博得一阵阵掌声。事后那学生找我,说他原本考经济系,是第二志愿进的中文系,父母担心他将来毕业没出路,只能去当老师。他自己也有顾虑,才这么问;没想到我对教师这职业还这么看重。不是学生的问题,在中国这样“官本位”的社会里,没弄个师长旅长当当,很不过瘾。在北大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主持人再三追问:你难道除了教授,再没有别的头衔?我明白他的好心,希望加强听众对我的印象。可我还是坚定不移:就是中文系教授。在很多人看来,都这么大了,没有校长,起码也得是个系主任,要不就是学会的会长什么的,什么都没有,那多难堪。

这里牵涉中国人对待学术的态度。2004年11月21日的《文汇报》上,报道英国《自然》杂志再推中文版增刊《中国之声II:与时俱进》,同时选载了若干文章,其中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的《“官本位”助长学术腐败》。陈文批评将科研机构负责人等同于官员的做法,使得有些人削尖脑袋往上爬;另一方面,行政主导色彩太浓,使得我们无法聘请外籍科学家来当研究机构领导。我看问题比这还严重,因为整个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惟官是尊、惟官是荣;纯粹的学问,没有多少人看好。学者也不例外,工作稍有成绩,就渴望获得某种头衔,虚实且不管。而上级主管部门,往往也把“封官”“定级”作为一种特殊奖励。好学者本就十分难得,如何经得起这般“栽培”与“提拔”?

两个多月前,我曾应邀到耶鲁大学做学术演讲,那里的朋友告诉我,校方本想要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当副校长,但被他谢绝了。大家都说他很聪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潜心著述,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要是在中国,我不知道有多少学者能抵挡得住这样“致命的诱惑”。

先是金钱的压力,后是名位的诱惑,对于大学教授来说,过了这两关,才能谈论什么独立与自尊。

(文章来源:陈平原,《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载《教育学报》2005年1卷1期,58-67页)

